

卢沟桥事变

楊 叶 編

河北人民出版社

声调符号

……

……

PD 38
1
2
ZL254.71

內 容 提 要

盧溝橋事變是現代史里的一個重大問題。

這書對盧溝橋事變前夕的國際環境，日本在華北的侵略活動；日本為什麼要大規模的侵略中國，事變的序幕和爆發，戰爭的擴大；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對中日戰爭的路綫、方針和態度等等，都據實作了簡明介紹。適合教師及其他有中等文化水平的讀者參考，可作圖書館和資料室的常備書。

盧 溝 橋 事 變

楊 叶 編

★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保定市裕華東路）

河北省書刊營業許可証第三號

建設日報石家莊日報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河北分店發行

★

1958年6月第一版 1958年6月第一次印刷

787×1092 1/32 • 24 印張 • 51,000字

印數：1 — 18,000冊 定價：（6）0.20元

統一書號：11086 • 5

后 記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弥补經濟危机造成的损失，在盧溝桥畔發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这个事变是日寇企圖奴役中国人民發动全面战争的开端，是革命史上重大的事件。作者企圖通过这本小冊子，簡要介紹一下抗日战争前夜国内外形势；抗日战争全面爆發的原因及經過；盧溝桥事变后全国人民憤慨激昂的情緒；中国共产党和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者的两种不同的立場；苏联和美英对中国抗日战争的不同态度。附帶批判一下以往許多書刊对吉星文錯誤的評價問題。

这本小冊子仅仅是史料的初步“整理”，或者叫“轉述”，算不得著作。由于作者的政治思想及文化水平都还很低，缺点和錯誤一定不少，欢迎大家給我以批評和指正。

在这本小冊子的編写过程中，蒙一些負責同志提供資料并审閱原稿，使这本小冊子减少了許多缺点和錯誤，謹在此統致衷心的謝意。

楊 叶

1958年春于北京

目 录

一	盧溝桥事变前夕的国内外环境	2
	(一) 盧溝桥事变前夕的国际环境	2
	(二) 日寇的步步入侵与抗日统一战线线的形成	4
二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加紧侵略	9
	(一) 日寇对华北的经济侵略及政治扩张	9
	(二) 盧溝桥事变前中日两国在华北的军事阵营	13
	(三) 盧溝桥事变前日本侵略军在华北 制造的挑畔事件	19
三	盧溝桥事变的经过	21
	(一) 日本为什么发动侵略战争	21
	(二) 盧溝桥的形势	22
	(三) 盧溝桥事变的序幕	24
	(四) 盧溝桥事变的爆发	26
	(五) 中国守军的英勇反击	29
	(六) 日寇利用谈判准备重来	33
	(七) 日寇边谈边进攻	37
	(八) 全国人民对第二十九军爱国将士的支援	41
四	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政策与战争的扩大	44
	(一) 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政策与日军的扩战准备	44
	(二) 宋哲元断送平津	48
	(三) 华北人民的继续斗争与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	53
五	盧溝桥事变后世界主要国家的态度	56
	(一) 德意英美怎样支持日本侵略中国	56
	(二) 苏联怎样援助中国抗日	59
六	中国共产党是怎样推动和领导中国人民的 抗日战争的	61

附：我們不能再受騙

——关于吉星文的评价問題

一 盧溝橋事變前夕的國內外環境

(一) 盧溝橋事變前夕的國際環境

盧溝橋事變前夕的國際環境，是非常複雜的。

1929年末，資本主義國家爆發了破壞力量空前巨大的經濟危機。直到1933年年底，資本主義各國的經濟，都在嚴重危機中不能自拔。個別資本主義國家用盡了各種辦法，工業少許活躍了些，但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例如美國、英國和法國等，工業生產都還沒有達到1929年的水平。根據1930年到1933年的統計，美國工業在1933年年底降到了1929年的64.9%，英國工業降到86.1%，德國工業降到66.8%，法國工業降到77.4%。^①

正當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生產還沒有達到1929年水平的時候，在1937年下半年，又重新陷入經濟危機中。新的經濟危機帶來的不是工業生產量的高漲，而是繼續顯著下降，失業人數也大量增加。首先是美國，到1937年年底，失業人數已增加到1000萬人。英國失業人數也開始增加起來。接着法國及其他許多國家，都又卷進了這個新的經濟危機。

與此相反，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却在蒸蒸日上地實行着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根據1930年到1933年的統計，蘇聯工業增長了一倍以上，1933年等於1929年的201.6%。^②第二個五年計劃到1937年4月1日，即四年另三個月提前完成了。

①見斯大林的“列寧主義問題”，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社1949年中文版第566頁。

②同註①。

到1937年年底，苏联工業达到1929年水准的428%，較战前增長了七倍以上。

在农業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有1850万农户参加了集体农庄。在1937年間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3%。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已經基本被消灭。①

这些数字，都充分說明着1937年苏联全部的国民經济，已更加蓬勃發展，社会主义建設已获得偉大的胜利。

随着社会主义經济的高漲，苏联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也大为提高。

两个世界的对比，鮮明地显示出社会主义經济制度的优越性。苏联的經济高漲，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更加仇視；资本主义世界的經济危机，就使帝国主义者对内加紧鎮压本国無产阶级，对外加紧掠夺殖民地。同时，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也随着尖銳起来了。

战争，是资本主义的不可避免的伴侶；而资本主义發展为帝国主义的时候，更是这样。资本主义国家新的經济危机，加速了它們用軍事行动来重新分割世界市場、原料产地、領土和势力范围，开始和扩大了帝国主义战争。1935年5月，意大利發动了侵略阿比西尼亞的战争，1936年7月，德国和意大利又武裝干涉西班牙的内战。在亞洲地区，日本帝国主义在1931年發动了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这些法西斯国家，都敌視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但又懼于苏联力量的强大，不敢冒然动手。

德、意、日發动的战争，不仅是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同时也危害英、法、美等国的利益。而英、法、美帝国主义一

①見斯大林的“在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总結报告”，“苏共党史”第十二章。

方面畏惧和仇視苏联社会主义建設的胜利；另一方面害怕欧洲工人运动和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漲，就把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当作抵禦世界革命的工具，甚至給德、意、日以帮助，来換取它們去鎮压世界革命运动，进攻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在資本主义經濟危机的襲击和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在企圖發動世界大战。当时，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企圖在一切交战国陷入战争泥坑而拔不出足时，它們挺身而出，迫使那些疲憊不堪兩敗俱伤的交战国，接受它們的帝国主义条件，即扩大自己的殖民地，确立在世界上的統治地位，奴役各国人民。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这种危險的局面中，深知侵略者發動的战争，既威胁着苏联的安全，也威胁着世界和平，就一面坚决奉行維護和平的政策，防止世界大战，建立和加强各国人民的友誼合作；一面竭力巩固国防力量，准备給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二) 日寇的步步入侵与抗日統一战綫的形成

日本帝国主义早就以对外侵略作为它的基本国策。1929年的世界經濟危机發生后，日本国内經濟情况十分恶劣，社会不安，階級矛盾日益尖銳，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轉移人民的視線，寻找出路，就在欧美資本主义国家陷于經濟危机無暇东顧时，进一步对中国加紧侵略，企圖变中国为其殖民地。

我国在“九一八”与“一二八”之后，中国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間的民族矛盾，已經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的階級矛盾也随之降到次要和从屬的地位。工人、农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历来都是要求抗日的，到这时，一部分曾經附和着大資產階級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在大敌当前

国家危亡的时候，也开始转变态度，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反对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对日妥协投降政策。

1932年6月到1933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中国。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对日本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步步妥协，相反的对中国人民红军发动了第四次围攻。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在1933年1月发表宣言，愿在“一、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的三个条件下，和国民党停战议和，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个宣言，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但国民党政府却置之不理，反在1933年10月又对红军开始了第五次大围攻。

在国民党政府积极进行反人民的内战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更有加无已。中央红军一方面为了冲破国民党政府的围攻；另一方面为了直接出兵北上抗日，实现“九一八”后坚决提倡的民族革命主张，就在1934年10月，退出江西根据地，进行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长征，终于战胜了种种艰险困苦，在1935年10月，胜利到达了陕西北部，与原在陕北的红军会合。

人民红军长征的胜利，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使人们对于革命和抗日救国运动的前途，有了希望和信心。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推动和领导下，曾进行了英勇的反击。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华北。中国共产党在红军的长征途中，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八一宣言），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号召全国人民，不分阶级，不分党派，共同团结，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挽救民族的

危亡。这个宣言，引起了全国各階層人民的普遍重視和热烈拥护，对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極大的宣傳和組織作用。特别是北平的青年学生們，深深感到华北局势的危急，在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書”的号召下，在共产党人刘少奇等同志的組織和领导下，爆發了“一二九”爱国运动。这一爱国运动，很快遍及到全国各階層中去，極大地推动了中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再兴，形成了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国内各階級的新关系，也推动了党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組成。

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其統治的殖民地，并已开始了对侵略行动，这就給中国人民提出了“反抗呢”，“投降呢”，还是“游移于兩者之間呢”的問題。当时，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的情况下，怎样抵抗并战胜敌人，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已給中国人民指出了正确的道路。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陝北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會議，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決議”，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政策。毛澤东同志根据中央的決議，在党的活动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毛澤东同志在分析了新的时期国内階級关系的变化，分析了紅軍長征的胜利和国民党区抗日民主运动的新發展之后，指出：“革命的陣势，是由局部性轉变到全国性，由不平衡状态逐漸地轉变到某种平衡状态。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党的任务就是把紅軍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切活动匯合起来，成为一个統一的民族革命战綫。”

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政策，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在国民党内也發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一部分下層分

子要求抗日，一部分上層分子，特別是亲英、美分子，由于日本和英、美矛盾的加深，也开始要求抗日。党的这个政策的提出，是适时和正确的，奠定了党对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理論基础，为实现全民抗战作了思想准备。

1936年12月，在西北“剿共”前綫的东北軍將領張學良，和十七路軍將領楊虎城，受了紅軍和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拒絕接受蔣介石进攻人民紅軍的命令，在12月12日發动了逮捕蔣介石的“西安事变”。国民党內部的分化，張學良、楊虎城的轉变，都說明国内阶级关系已發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蔣介石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場，更是“西安事变”的主要原因。事变發生后，国民党集团中的亲日派和政治野心家如何应欽等，竭力想扩大內战，乘机夺取蔣介石的实权；日寇也企圖乘机向中国發动大規模的进攻。这时，全国立刻出現了一种非常复杂和緊張的局面：或者和平解决，停止內战，一致抗日；或者是發生更大規模的內战，更加便利于日寇的侵略。

“西安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認為只要把南京与西安間的战争挑撥起来，就可以坐享“不战而胜”的利益。积极“監視事变的进行”。①欢天喜地認為：“南京已决定反共討張的态度，任何应欽为討逆总司令，一扫中国政府將發生任何內訌之疑惧的暗云。”②大坂“朝日新聞”說：“在这时候，中国就可以明了日本所希望的华北特殊化和共同防共是何等具体，何等紧急的必要了！”日本当局表示願意給国民党發动內战以援助，对和平解决不能繼續“靜观态度”。③日本駐中国

①見1936年12月，“日外务省陸軍三省決議”。轉引“九一八以来的新中国”，中国現代史研究会編，1943年出版。

②見1936年12月16日，东京“朝日新聞”社論。

③見“九一八以来的新中国”，第133頁。

大使川樫茂，也往来忙于进行煽动中国内战的活动。

日本侵略者除进行阻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外，还指使华北的汉奸，发表加紧“剿共”，改造局面的宣言，以便促使中国内战的扩大。

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亲日派，都竭力企图利用“西安事变”的机会进行和扩大内战，以便利于日本的侵略；而真正代表中国人民意志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全民族的利益，争取一切可能的力量转变到抗日战场上，使中国革命运动由国内战争阶段转变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所以主张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就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这一事变。为此还发表了“和平通电”，提出和平解决的具体办法。这一方面避免了内战，也堵塞了日本乘机进攻中国的道路；另一方面又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介石在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后被释放。中国共产党在这次事变中的正确政策，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为着巩固已经获得的国内和平，打击汉奸、亲日派的挑拨离间，为着帮助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有利于准备抗战的决议，以便团结全民族来抗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倘国民党能够确定这种国策，中共中央就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二、苏区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統一战綫之共同綱領。”接着，宋庆齡、何香凝、馮玉祥等向国民党三中全会建議恢复孙中山先生的联苏、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实行抗日。除了極少数亲日分子反对外，一部分曾經附和大資產階級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在广大人民力量的推动下，也表示贊同。終于通过了实际上接受合作的決議案。这样，便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初步形成，使中国革命运动由国内战争的阶段，轉变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

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會議，毛澤东同志在这會議上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又做了“为爭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統一战綫而斗争”的會議結論，指出了統一战綫的广泛性和抗日战争的全民性。这个會議，为抗日战争在政治上和組織上做了重要准备工作。

二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加紧侵略

(一)日寇对华北的經濟侵略及政治擴張

华北地方，在历史上就处于很重要的战略地位。五代时，晋的石敬瑭为了爭夺地位，乞求外族的帮助，不惜出卖民族利益，割讓燕云十六州（今河北、山西兩省的北部）給契丹。晋將刘知远曾劝他：“以金帛賂之足矣，許以土地，异日必为中国之患。”石敬瑭不听，竟許之。后来塞外新兴的种族金、元相繼占領了这个有战略价值的地方，所以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使中国受外禍四百多年，到明朝才收复回来。

宋朝时，民族英雄岳飞，曾和招撫使張所討論过河北的形势，說：“昔人有言，河北視天下如珠璣，天下視河北犹四肢。言人之一身，珠璣可無，而四肢不可暫失。”^①随着历史的發展，华北淪陷，中国虽不一定亡，但它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价值，还是相当重要。

由于华北的地理关系和形势的重要，日本侵略者在侵占我国东北后，势力就逐渐伸入华北。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政政府派熊斌和黃郛为代表，和日寇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定”，事实上已經公开承認日本侵略者占领东三省和热河，并进一步承認河北东部一带为非武装区，便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这样，整个华北無疑地放置于日本侵略軍的監視控制之下了。

在“塘沽协定”之后，日軍立即占领了察东的赤城、龙关和察北的沽源、崇礼等县。日本侵略者还一手制造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伪組織，把冀东大部富庶地区，控制在手里。又利用汉奸地主武装宁雨时的部队窜扰昌平、房山等县，以便包围北平。于是，北平、天津兩市，也在敌人的監視与軍事势力的控制之下，接近于名存实亡了。

北平和天津，不仅在华北和中国，就是在亞洲和世界来说，也是有名的都市。在这里有良好的矿山，近代化的工厂，还有完整宏大的兵营、飞机場，又是华北交通的樞紐。特别是天津的大沽口，是远东有名的吞吐港。这样，日本从最东边的朝鮮海港起，有安东、大連、营口、葫蘆島、秦皇島以及天津等海港，都可以同国内直接通航。^②

从华北形势的重要性上，我們就可以理解日本帝国主义

①以上材料見“五代史”“宋史”及“河北与平津在軍事上的价值”，“滄報”1937年7月13日。

②見“河北与平津在軍事上的价值”。

为什么要提出“华北明朗化”、“华北特殊化”口号的真实意义了。①

远在1935年1月2日，日本外务相广田在六十七届議会上發表了什么“中日亲善”“經濟提携”等演說后，即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和輿論界的駁斥，②但国民党政府却違背了广大人民的意志，对日本侵略者抱有幻想。蔣介石还口口声声說“中日有提携之必要”。③在国民党政府的合作下，果然“中日經濟提携”实现了。

首先是日軍指使大批特务流氓，挾藏携帶和明目張胆地把人造絲、呷噉、砂糖、煤油、杂货、玩具和鴉片、海洛英等二十多种貨物和毒品，源源不絕向华北运来。④

1935年6月9日，駐华日本軍司令梅津与国民党政府代表何应欽秘密簽訂了卖国的“何梅协定”。同年9月10日，蔣介石發表了“中日关系的回轉”一文，說什么“中日兩國無論在那一方面看，都應該提携協力”。中国考虑日本的利益，“作相当的妥协讓步，不一定不可能”。此后，国民党政府派吳鼎昌帶經濟考察团到日本；而日本也派經濟考察团到北平。正在双方經濟代表团来往匆忙之时，在日寇的指使下汉奸殷汝耕，在通州組織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內蒙的伪軍李守信、汉奸德王等，也組織了“內蒙自治政府”的汉奸傀儡政权。

民族敗类卖国贼蔣介石，为了討好日寇，下令設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派宋哲元、王揖唐、王克敏、高凌霨、賈

①見傅印泉的“中国抗战的前途”，内外杂志出版社1938年4月版。

②見“申报”1935年4月1日。

③見新华社的“从九一八到七七”，冀东新华書店出版。

④見“盧案發生前之醞釀”，“國聞周報”14卷28期。

德耀等为委员，把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另划成一个行政区，使华北变成特殊地区，受日本侵略势力的管辖。而著名的汉奸王克敏、王揖唐、高凌霄、賈德耀出任这个组织的要员，更是日寇所欢迎的。11月7日，日本关东军特务长土肥原到天津，策动宋哲元联合华北五省，脱离南京政府，①制造中国的分裂与混乱。

这就是蒋介石所说的“中日关系的回轉”。

在国民党妥协政策的蔭庇下，日本在华北的走私風气日盛，因路远不便，改用長途汽車运输，不分晝夜，来往于津（天津）保（保定）、津滄（河北滄县）之間。經過滄县、高陽，把貨物深入內地各县。天津海关的緝私分卡，遭到走私特务流氓的开槍射击。甚至走私商人还可以武裝占領稅卡②。显然，这些武裝走私是受日本軍人的直接支持的；日军又通过特务流氓的武裝走私，偵探地形，搜集情报，散布謠言，为軍事行动开辟有利的道路。

此外，日人还喧嚷开发华北經濟，和宋哲元在天津商談所謂“經濟提携协定”，列出修路、筑港、通航、植棉……等八項，設立开发华北經濟的主要机关“兴中公司”。这个公司是日本关东軍岡村宁次、坂垣征四郎等人組織的，名义上是开发經濟，骨子里無时不从事政治、軍事的侵略陰謀。企圖修筑直接深入內地便于其侵略的公路、鐵路。③

在“中日經濟提携”的口号下，仅1936年5月5、6兩天的統計，日寇走私貨物运京总数达三千吨。13日，海关报

①見新华社的“从九一八到七七”，冀东新华書店出版及張健甫的“近六十年来中日关系”，1933年4月，生活書店再版。

②見“盧案發生前之醞釀”，“国聞周報”14卷23期。

③同注②。

告，仅日人在华北一带走私偷税的损失，九个月来达二千五百万元法幣。^①

日本在开发华北的名义下，把势力进一步深入华北。又大量增兵，公然改天津駐屯軍为华北駐屯軍，作为武装侵略华北的最高机关。新增的日軍，都改为战时的編制，还大量修筑炮台，在平汉、津浦、北宁、平綏等各路沿綫，屯駐軍隊。又唆使伪蒙边防軍騷扰綏东一带，制造华北紧张局势。

1937年春，日本又派財政要人兒玉等，組織經濟考察团来华，积极进行拉攏亲日派工作，又派銀行國債局長来华，周游华南、华中各地。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又增設經濟調查部，以便調查中國經濟部門的情况，作为大规模武装侵略的准备。日軍日艦，又不断在沿海各重要地区，举行示威，甚至無故用机槍向岸上扫射。

正像中共中央發表的“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蔣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指出的：“以蔣介石为罪魁祸首的国民党政府，泰然不以为耻的答应了日本的要求，輕輕把整个华北，整个中国出卖了！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二) 盧溝桥事变前中日兩國在华北的軍事陣营

日軍方面

国民党卖国政府通过了“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放手把华北的軍事、政治和經濟，都交給了日本帝国主义来控制。但貪得無厭的日本侵略者，并不以此为滿足，除繼續扩大政治、經濟势力外，更不断調兵遣將屯駐华北，企圖时机成熟，一举武装占領华北，并企圖进一步灭亡全中国。

^①見新华社的“从九一八到七七”，冀东新华書店出版。